

清末日语教育概述

窦 硕 华 日高 一字（乌 冬青）*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清末における日本語教育

Japanese Education at the End of Qing Dynasty

Dou shuo hua and Kazuie Hidaka (Wu dong qing)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摘要]

近代中国日语教育发端于甲午战争之后。在大陆地区，以京师同文馆设立东文馆为契机，东文学堂纷纷出现，形成了一个学习日语的高潮。近代新学制颁布后，伴随着中国新式教育的发展，日语教育在各级各类学堂展开。而在台湾，“关东州”等日本占领地，呈现了独树一帜的日语教育局面。本文拟就清末日语教育的发展脉络作一综述，展现其发展历程及成就，从而揭示清末日语教育的特点与影响。

Abstract

近代中国における日本語教育は日清戦争後に始まった。大陸においては、京師同文館(Jing shi tong wen guan)が東文館(Dong wen guan)を設立したのを契機に、東文学堂が陸続として生まれ、日本語学習の高潮期を作った。新学制が公布されてから、中国の新しい方式の教育の発展に伴い、日本語教育もあらゆるレベルの学校で展開した。台湾(Tai wan)や日本占領下の関東州(Guan dong zhou)などでは、独自の日本語教育の局面も現れた。

本稿では、清(Qing)末における日本語教育の発展の過程を概観し、当該時代の日本語教育の特徴と影響を明らかにする。

[关键词] Key words : 清末, 日语教育, 同文馆, 东文学堂, 学制

一. 清末日语教育之肇始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各种不平等条约接踵而至。一向以“天朝文明”自诩的清朝陷入无法自保的境地。为了抵御外辱，谋求振兴，巩固清廷统治，一场以“自强”，“求富”为目的的洋务运动随之兴起。欲“师夷长技”，其首要手段就是创办“西学”，而“西学”的第一步离开外语教育则无从谈起。1862年，京师同文馆创立，这标志着中国官立西方语言文字教育正式登上历史舞台。随后的1863年，上海广方言馆成立；1864年，广东同文馆成立。三所同文馆呈现中国外语教育三足鼎立之势。此外，其后开设的外语学堂中，较有影响的还有新疆俄文馆（1887），台湾西学馆（1887），珲春俄文书院（1889）及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湖北武昌设立的湖北自强学堂（1893）。

各式外语学堂开办后，英，俄，法，德语教育如火如荼地展开，但日语教育直到甲午战争时还难觅踪影。甲午战争清朝惨败后，中国人的日本观陡然一转，“以日为师”成为一种社会风气，日语教育方初见端倪。1897年初，京师同文馆增设东文馆，开辟了中国大陆地区日语教育的先河。因京师同文馆其他语种已有三十年较为成熟的教育经验，所以日语教育的实施可以直接套用原有的课程设置，

教学方法，教育制度及学生管理制度，为培养日语人才提供了捷径。东文馆开办后的第二年即1898年就有17人参加了大考，并有5人记优。京师同文馆东文馆第一批入学的文澜，1905年曾作为翻译随裁泽，李盛铎，尚其亨出访考察日英法等国，这从侧面印证了同文馆的日语教学成果。1900年义和团运动兴起，随着外国军事实力的入侵，中国境内硝烟弥漫，受其影响，地处政治中心的京师同文馆被迫关闭，结束了短暂的使命。1902年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改制为译学馆。

在京师同文馆东文馆设立的同年3月，广东同文馆也开设了东文馆。其日语教育规模明显较京师同文馆有所增加。据明治30（1897）年9月20日日本《教育公报》所载《清国广东同文馆》中记载，东文馆第一届学生数就多达27名。而从1901年参加考试的人数来看，英文馆24名，俄文馆12名，东文馆22名，日语教育已经跃居第二位，而与东文馆同时添设的俄文馆在教育规模上显然已无法与其抗衡。广东同文馆的另一贡献是日本教习长谷川雄太郎结合自己的教学经验编纂了教科书《日语入门》，于1900年发行，成为清末出现的较早的日语教科书。由于其出色的编纂方式，该书对清末其他日语教材产生了很大影响，许多教材在编写时都或多或少参照了《日语入门》，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东文馆持续了6年后的1903年，广东同文馆并入广州驻防中学堂。

* 北九州工業高等専門学校名誉教授

另一重要地方教育机构湖北自强学堂对外语教育的重视丝毫不亚于三大同文馆。从其成立伊始确定的培养目标就可窥见一斑：“造就通材，所期远大，欲使学者皆能自读西书，自研西法，则可深窥立法之本源，并可曲闡旁通之新义，既不必读辗转传翻之书，致得粗而遗精，亦不至墨守西师一人之说，免致所知之有限。将来学成以后，通殊方之学，察邻国之政，功用甚宏。”^[1] 在 1893 年初设之时，方言馆只设英，法，德，俄四门。1898 年 5 月 5 日张之洞奏《自强学堂改课五国方言折》：设日本及英，法，德，俄五堂，选以通中文者为学，每堂三十人，共百五十人。^[2] 自此日语教育落户湖北自强学堂。

自强学堂修业年限为五年。从日后实际招生数量看，除东文学堂择取二十名外，英，法，德，俄文学生各择取十五名作为定额。从自强学堂内日语学生数量可以看出对日语教育的重视，这缘于 1898 年张之洞写成影响社会风气之巨著《劝学篇》，留学风潮渐开，留学教育的先行教育扎根湖北。自强学堂亦顺应这一形势需要，为留学日本作准备。日文馆成立不久，张之洞曾应总署的要求选派一批学生，由钱恂带队赴日留学。第二年，日方大谷方丈来湖北参观自强学堂，又选带二人赴日入西本院寺学习。据 1899 光绪己亥年的东文馆日课时刻表，共包含日语，汉文，历史，体操等 8 门课程，每周日语 12 课时，占 38%，而排在第二的汉文有 8 课时，占 22%。^[3] 从课时数量来看，足以体现外语课位置之重。自强学堂作为地方教育机构，在办学理念上摆脱了中央行政的羁绊，显示了高度的自主性和灵活性，为日后外语教育的发展做出了不菲的贡献。

综上所述，同文馆作为官办外语教育以强有力的姿态在中国教育舞台上捷足先登，奠定了中国外语教育的基础。其中的京师，广东两馆东文馆及湖北自强学堂的日语教育则成为中国日语教育的发端。

二. 地方私立日语教育的发展

同文馆的先导性促进了地方外语教育的发展，而馆中的官办日语教育则有力地推动了民间日语教育的发展。1898 年到 1902 年间，东文学堂如雨后春笋，纷纷诞生，掀起了创办日语教育的一个高潮。

首先是有识之士靠私人力量创办的东文学堂。1898 年旧历 2 月，《农学报》主编罗振玉创办了上海东文学社，成为清末最初的东文学堂。其社章清晰地阐明了创立动机：①因将来中东交涉之事必繁而通东文者甚少故；②因译书译报动须远聘故；③中东人士语言不能相通将来游历交接种种不便故。^[4] 首届学员为当时的一些知识层人士，学习日语的目的正如上述第二条所示：以便尽快通读日文，翻译日本农书，传播农业科技知识。

在这种以实用主义为目的的“取法日本”学习风潮下，许多东文学堂相继开设：北京东文书馆（1898，蔡元培创办），江苏淮安东文学堂（1899，罗振玉创办），安徽东文学堂（1899，李鸿章创办），广东岭东同文学堂（1900，丘逢甲创办），协力四川东文学堂（1900，周善培创办）等。这些学堂大多分布在北京，上海，江苏，安徽，广东，

四川，湖北等省份，一则这些省份社会风气较为开放，容易接受新生事物；二则经济相对发达，日本人稍多，容易聘任师资。从学堂称谓上看，多冠以“东文”字样，这与同文馆开办的日文馆谓之“东文馆”一脉相承，据说有以下两种原因：一因甲午之战，官员们为堂堂中国同一小日本打仗，说起来丢人，意思是它不配与中国为敌，避免中日合称，而云中東之战，所以名曰东文；二因其他四国文字都是西文，所以此名曰东文。^[5]

此外，还有一些不为人所知的学校，如革命党干将黄兴在赴日留学之前，自 1901 年 9 月到次年 5 月曾在湖北省武昌县华林学习日语，但由于史料不全，校名至今不详。清末大儒孙诒让曾开办瑞安方言馆教授英文及东文，但东文教育的具体实施情况尚无资料佐证。另有一些地方官吏或开明绅士曾开创日语教育，但因规模不大，开办的时间也很短，故在史册上不见经传。因此可以说，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中国人创立的日语学校不在少数。这是中国人学习日本的自发要求下的必然结果。

在中国人积极开创日语教育的同时，日本人也以不同的目的在中国开办日语教育。其中，固然有日本人报以中日友好的目的支援清朝的教育，但更多的还是从日本自身的利益出发，企图通过文化渗透和教育扩张，培养日本在华殖民势力。1898 年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给外务大臣西德二郎的信函已经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如果深受日本感化的中国新人才散布于古老帝国，便是今后日本势力树立于东亚大陆的最佳策略。^[6] 在这种政策支配下，日本人开设了许多学堂。如上海日清英学堂（1898），天津东文学舍（1899），金陵东文学堂（1899），杭州日文学堂（1899），苏州东文学堂（1899），广州东文学校（1899），天津日出学馆（1900），福建泉州彰化学堂（1901），福建漳州日华书院（1902），另外还有北京的东亚善邻学堂，日英速成学校，日语速成学堂，日英语学堂等。

日本人经营的学堂，体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个人经营的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天津三大城市，而实力团体如本愿寺，东亚同文会经营的主要在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江南地带。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京城及周边地带政治氛围保守，私人力量因较少涉及政治目的被允许办学，而外来集团势力因其政治影响却难以在京师立足。

除此之外，还有中日两国共同创办，共同参与管理的学校，如福州东文学堂（1898），北京的东文学社（1901）等。其中北京东文学社培养了一批教育人才，如后来成为京师大学堂提调的蒋式理，山西大学堂总办莲甲，直隶学校司参议丁维鲁等人，均是在此学习东文，接受近代知识熏陶，最终从事新式教育的。

清末私立日语学堂因受各种因素影响，往往中途夭折，许多学堂存在时间仅有一年半载，但它为中国的日语教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为同期大批中国人留学日本铺设了道路。

三. 新学制颁布后的日语教育

甲午战争以后,许多知识层人士纷纷游历日本,各地官员也不断到日本考察,同时留学日本逐步展开。历经七,八年间的铺垫期后,学习日本渐行深入。在这种背景下,日本的近代学制扎根中国。1902 年至 1904 年间,清政府仿效日本学制分别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与《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诞生了近代第一个学制。1905 年废除科举制度,同时成立了学部,统辖全国教育行政事务。这些教育改革举措促生了近代新式教育,大学堂,高等学堂,师范学堂,方言学堂及中小学堂迅速发展。日语教育遂在各级学校中相应发展起来。

1. 大学堂日语教育状况

1902 年《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提出“拟于预备,速成两科中设英,法,俄,德,日五国语言文字之专科,延聘外国教习讲授”。^[7] 并仿照日本详细列出大学七种分科门类,其中文学科下设外国语言文字。1904 年 1 月 13 日(旧历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清政府颁布的《奏定大学堂章程》正式提出文学科大学设置外国文学专业,分为英国文学门,法国文学门,俄国文学门,德国文学门,日本文学门。其中日本文学门与所有其它文学门一样,每周总课时 24 个钟点,其中主课日语日文 9 个钟点,补助课有日本近世文学史,日本史等 6 门,此外还有随意科目。

在中国近代教育中,京师大学堂是由政府创办的第一所多学科的综合性大学。京师大学堂下设译学馆,由京师同文馆演变而来。《奏定译学馆章程》规定译学馆“以译外国之语文,并通中国之文义为宗旨,以办交涉教译学之员均足供用,并能编纂文典,自读西书为成效”,“译学为今日政事要需,入此学者皆以储备国家重要之用,自以修饰品行为先,以兼习普通学为助”。^[8] 译学馆外国文分设英文,法文,俄文,德文,日本文 5 科,每人认习一科,规定不得兼习。无论所习为何国文,皆须学习人伦道德,中国文学,历史,地理,算学等普通科目。教学方法及课程设置为先授以缀字,读法,译解,会话,文法,作文,三年后普通科习完,所余钟点改授专门学,为交涉学,理财学,教育学三科。学习以 5 年为限。

1903 年九月十四日,译学馆开校授学,首届学生除公开考试招入者,还有大学堂速成科仕学,师范两馆中能习外国文字者。至宣统三年(1911)九月译学馆停办,共招考 5 次,定名甲,乙,丙,丁,戊五级。各级入学日期,毕业年份与人数如下:^[9]

甲级	光绪二十九年	考入 92 人
	光绪三十四年九月	毕业 41 人
乙级	光绪三十一年 ^[10]	考入 120 人
	宣统元年九月	毕业 69 人
丙级	光绪三十一年	考入 73 人
	宣统二年九月	毕业 40 人
丁级	光绪三十二年	考入 300 人
	宣统三年八月	毕业 139 人
戊级	光绪三十三年	考入 50 人
	宣统三年九月	毕业 61 人

译学馆在人才培养,教学要求,课程设置等方面较以前的同文馆更胜一筹,办学成就突出。译学馆近十年间培养了相当数量的外交人才,翻译人员和文典编写人员。曾在译学馆讲授国文及西洋史的蔡元培先生在为 1931 年出版的《京师译学馆校友录》一书的题词中写道:“译学馆为偏重外国语之学校,其所以与同文馆,广方言馆等不同者,有两点:一兼习国文;一兼授其它学科;是也。有此二者,是以译学馆虽办理不久,同学亦为数不多,然而其中之高材生,或服务社会,卓著成绩;或更求深造,成为专门学者;或从事译著,有信,达,雅三长;使此短期之学校,在历史上可以不朽。”^[11]

2. 中学堂,高等学堂日语教育状况

光绪二十九年底(1904 年初)颁布的《奏定中学堂章程》提出“外国语为中学堂必需而最重之功课,各国学堂皆同。习外国语之要义,在娴习普通之东语,英语及俄,法,德语,而英语,东语尤为要;使其临事应用,增进智能。”^[12]可见,在中学堂已将日语与英语等同置于外语科目之首。而与中学堂学力相当,学科程度大略相同的初级师范学堂,针对其制定的《奏定初级师范学堂章程》也提出了“英语,东语尤为要”的策略,日语教学内容为读法,译解,会话,文法,作文,习字。在中学堂程度的外语教育方面,日语教育处于显要地位并取得一定程度的发展是毋庸置疑的。

《奏定高等学堂章程》规定,高等学堂所修外国语限定范围为英语,德语,法语,教学内容皆为讲读,文法,翻译,作文。虽有此明确规定,但各地高等学堂出于各种原因并未完全遵照执行,所设外国语种参差不齐。有的高等学堂也开设日语课程,如甘肃文高等学堂就曾开设日,俄,英,法 4 种外国语。^[13]

当时江苏的最高学府,被誉为“中国师范学堂之嚆矢”的三江师范学堂在 1902 年筹办之初,就首设日文教学。其目的是便于中日教习“互换知识”,即日本教习在中国教习指导下学习中国语言文学及经学;中国教习向日本教习学习日语及理化,图画等等,以练习中国教员分科教授之法。1904 年学堂开学后,共开课程十七种,其中英文,日文各占一门,日文教习为柳原又熊,那部武二。1906 年三江师范学堂易名为两江师范学堂,日语教育进一步发展,直到 1911 年学堂解散。

3. 专门外语学堂日语教育状况

随着新式教育影响的不断扩大,各地省份纷纷设立方言学堂,以备形势之需。在留日风潮正酣的 1903-1904 年间,诞生了一批实施留学预备教育的东文专习学堂,如保定公立东文学堂(1903),四川成都东文学堂(1903),云南东文学堂(1904),资州东游预备学堂(1904)等。

1908 年庚子退款后,除了留学日本,赴欧美留学之引力渐强,一些多语种方言学堂得以开设,如江西方言学堂就曾开设英,法,俄,日四国语言文字。1908 年的《东方杂志》第六期对江西方言学堂的报导正说明了其办学目的:“赣省方言学堂初办草创,仅设英,法,俄,日四国语言文字科学,为派遣出洋之预备。”^[14]

清末最后十年,对外交往日盛,各地为培养急需的外交及翻译人才,开设了许多地方性外语学堂。在东北地区,1907年吉林省创办了吉林外国语学堂,专习英,法,俄,日,德5国语言文字,每科定额30名,学习语言文字之暇研究各国现行政要,历来交涉成案等。光绪三十四年(1908)正月,辽宁省奉天方言学堂成立,挑选中学程度较优者入堂学习英,日,俄3科。在华中地区,湖北彭君方言学堂内分英,法,德,俄,东五国语言文字,《警钟日报》1904年11月报导湖北彭君方言学堂如下:“江夏组织彭君方言学堂一所,内分习英,法,德,俄,东五国语言文字,创办暂设英,东两科。聘日本某氏及美国某氏主教,每月收学金二元。现已告曰收考,应招者不乏人。”^[15]

四. 台湾,“关东州”·满铁附属地的日语教育

1895年,甲午战败的中国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台湾从此划归日本版图。日本在台湾实施日语教育长达50年之久,直至二战结束。早于大陆京师同文馆开办东文馆的前两年,即1895年7月16日就在芝山岩学堂招收六名台湾子弟,进行为期不足三个月日语强化训练,这是日本在台湾实施日语教育的开始。

随后到清朝结束的16年间在台湾建立了各类学校,而日语教育主要在初等教育机关展开。日本据台初期建立的学校有国语学校,国语传习所,公学校以及为高山族专设的蕃人学校等。国语学校原是台湾人学日语,日本人学台湾话以及培养日语教师的学校,后来发展为拥有语学部,师范部,讲习科,实业部,中学部及附属学校的综合教育机关,对台湾人的日语教育主要是语学部及附属学校进行。国语传习所是台湾殖民当局在台湾设立的初级日语学校,其办学宗旨为“教授台湾人国语,助其日常生活,以养成日本国民精神为宗旨”^[16](「本島人ニ国語ヲ教授シテ其日常ノ生活ニ資シ且日本国の精神ヲ養成スルヲ以テ本旨トス」)。据1897年的统计,共设16所,分教场34处。^[17]1905年公布敕令第二十六号,原来的国语传习所废止。而在其他学校,国语课程无疑成为最重要科目。1904年以后,仅日语课程几乎高据40%到50%,而汉语课却沦为辅助科目。

日本殖民当局认识到,要长久统治台湾,其手段就是通过语言教育,进而深入理解日本精神,最终成为日本的忠实臣民。日本国粹主义者台湾总督府民政局学务部长伊泽修二(伊沢修二)在登台伊始,就制定了台湾人日本化的同化方针,为此他被称为台湾日语教育的创始者。日本学者国府種武在评价伊泽修二的教育方针是:本島人に国語による知識の収穫を漫然と期待されたのでなく,国語教授により台湾人を日本人にしてしまふ熱烈な意図を持って居られたので,元は国家主義教育説からの当然の帰結でなければならない。^[18]

清末期为日本占领台湾的初期阶段,日语教育政策不断演变,开办学校也经常会临机应变,这源于日本对异民族教育缺乏经验。从据台50年的历史看,这个阶段可以

称为日语教育的摸索试验期,但同时也是同化主义教育的形成期,这为1937年后实施皇民化教育阶段做了铺垫。

在东北地区,日语教育的创始因为日本的利益关系而独树一帜。1904—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从俄国手中攫取了“关东州”(大连,旅顺等地)的租借权,同时夺得长春到大连的南满铁路及其附属地权益(史称“满铁附属地”)。1904年12月,由金州军政署设立了南金书院民立小学。次年9月,改名为关东州公学堂南金书院,这是日本在中国东北开设日语教育的开始。

1905年后,日语教育在各类学堂逐步开设。1906年3月31日,关东州都督府制定了《关东州公学堂规则》,第一条规定“公学堂向中国人子弟讲授日语,施展德育教育,传授日常生活所需要的知识技能为办学宗旨”。^[19](公学堂ハ支那人ノ子弟ニ日本語ヲ教ヘ德育ヲ資シ並ニ生活ニ必須ナル普通ノ知識技能ヲ授クルヲ以テ本旨トナス)1908年关东府第15号令修订的公学堂规则,确立了日语教育的中心地位。截至1911年,关东州的5个行政区的中心地点共设置了7所官办的公学堂。另外,蒙学堂,小学堂的日语教育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而满铁染指东北教育丝毫不亚于关东州,满铁第二任总裁兼关东都督府民政长官中村是公主张:要做到在满铁沿线,日本人所到之处只讲日语就可以办事。^[20]所以满铁把普及日语作为经营东北的首要任务。1909年6月满铁设立第一所中国人小学——盖平公学堂,标志着对中国人的教育正式开始。盖平公学堂每周30课时,其中日语占6课时。1910年10月1日,瓦房店日本小学校熊岳城分教场设中国学生特别班教授日语后,各地日本人小学校均设立特别学级招收中国学生。于是,日语教育漫及铁路沿线的各个角落。

五. 结语

清末中国既有要了解日本,学习日本先进科学而必须进行日语教育的自发性,也有日本在台湾等占有地实施日语教育的强制性;日语教育既在专门的东文学堂和日文学堂展开,也渗透到大中小学校;既有松本龟次郎式的日本人友好支援,也有日本政府的政治企图。因此清末日语教育的创始与展开具有多维度,多层次性。

关于日语教育史的研究,既涉及宏观政策法规的整理与解读,又包含微观领域如师资,教材,教学法等具体内容的考察。含盖面广,内容繁杂,因此这一阶段的日语教育史研究难以做到面面俱到,只能将各个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事件,学校,法规作为素材去梳理。

另外,由于侵华战争的影响,对近代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论上的侵华教育研究,缺乏语言学角度的探讨。或者从语言学角度入手,从日语教育的展开去分析中日关系的演变也将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重要课题。因此,本文对清末日语教育概况做一简单梳理,意在抛砖引玉,引起更多专家学者对该领域的关注。同时本着历史研究“鉴古知今”的意义,在当代中日和平友好的时代主题下,期望日

语教育取得更大进展,为中日两国经济文化交流作出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 [1] 朱有瓚,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p307。
- [2] 朱有瓚,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p311。
- [3] 高晓芳,晚清洋务学堂的外语教育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pp193-194。
- [4] 刘建云,中国人の日本語学習史[M],東京:学術出版会,2005:p101。
- [5] 齐如山,齐如山回忆录[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p26。
- [6] 王桂,中日教育关系史[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p331。
- [7] 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p244。
- [8] 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p435。
- [9] 蔡璐,京师译学馆始末[A],文史资料选辑(第40辑)[C],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pp195-198。
- [10] 原文如此。估计此处为作者回忆时错误,根据毕业年份为宣统元年(1909),而学制为5年,所以入学年份可能为1904年,即光绪三十年。
- [11] 李良佑·张日昇·刘犁,中国英语教学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8:p120。
- [12] 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p329。
- [13] 赵元贞·水梓·谈凤仪,清末甘肃文高等学堂的回忆[A],中华文史资料文库文化教育(17卷)[C],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p111。
- [14] 李良佑,张日昇,刘犁,中国英语教学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8:p39。
- [15] 李良佑·张日昇·刘犁,中国英语教学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8:p39。
- [16] 国立国語研究所,日本語教育沿革年表[M],東京:日本語教育センター日本語教材開発室,1979:p126。
- [17] 台湾教育会,台湾教育沿革誌[M],東京:青史社,1939:p211。
- [18] 国府種武,台湾における国語教育の展開[M],台北:第一教育社,1931:p17。
- [19] 嶋田道弥,満洲教育史[M],大连:文教社,1935:p119。
- [20] 齐红深,日本侵华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p180。

(2010年9月24日 受理)